

东镇路最后的民国老宅

李济深旧居：



东镇路老房子背后的抗战记忆

在桂林市东镇路 11 号两江四湖木龙湖景区内，有一座仿西式小洋楼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屋顶四角攒尖前后出厦，铺盖小青瓦，外墙立面全部经抹灰拉毛处理，墙面刷黄色涂料。这座风格独特、具有典型地方时代特点的民国建筑，正是李济深（桂林）旧居的主楼。

走进房子可见，一、二层的楼地板均以木板铺设，上层八间，下层七间，有会客厅、书房、卧室等。抗战初期，旧居除主楼外还设有花园、车库、警卫室等。1940 年 7 月，原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改组为桂林办公厅，李济深到桂林任办公厅主任，此后近四年的时间里，他就居住在这幢房子里。

李济深是国民革命军元勋，在国民党内地位颇高，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两大主张的绝对拥护者，与消极抗战的蒋介石水火不相容，在诸多决策上与蒋介石存在矛盾。

1940 年，蒋介石为了不让李济深继续牵制自己，便派李济深到桂林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这个职务当时在桂林并无实权，但仍是当地最高长官，一些纪念大会、庆典和一个月两次的党政谈话会都由李济深主持，在各界各场合中，只要他在，众人都要给他面子。

当然，李济深的“江湖”地位并非全靠他这一官半职的光环，更多是因为他始终致力于民主、抗日、爱国，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来桂林的民主爱国人士提供方便和庇护。

李济深到桂林任职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八办”与救亡日报社等革命据点被迫撤销，在这两所“老房子”里打拼了两年多的抗战人员被迫离开桂林，转移到其他城市。要知道当时蒋介石的反共潮来势汹汹，大批共产党员能否全身而退，这就要看当时广西这批掌权者的态度之冷暖。

夏衍撤离桂林时，上级指示他去找当时“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旭初，向其表示“好去好来”。黄旭初对夏衍说“时局是会好转的，那时候，欢迎你再来”，当场吩咐手下帮夏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而当时夏衍乘坐的民航航班就是由李济深任职的桂林办公厅所控制。在他们的帮助下，夏衍得以秘密离桂前往香港。

李克农撤离时，周恩来则亲自致电李济深，请他为“八办”撤退工作尽量给予方便。李济深特别交代下属随时了解情况并向他汇报，在蒋系特务包围“八办”的情况下，李济深给李克农秘密传话，通知“克农即走”，并借来黄旭初的座驾，护送李克农安全抵达机场，离开桂林。

可见，在这波反共潮中，国民党广西高层们对共产党与进步文化人士的态度与蒋介石相左。曾在桂林从事文化活动的林焕平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桂系在反共中，没有把事情做绝：封生活书店等，它用‘限期停业’的办法；对一般文化人出走，它发放行条；对著名文化人离桂，则采取‘送礼’的做法。这正是桂系与蒋介石仍有矛盾的表现。这为桂林文化城的后期发展，留下了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统战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广西就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简单说就是多交朋友，多做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一些上层代表人士，他们不仅成为了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朋友，而且当共产党人与进步文化人士遇到危难时，他们还挺身而出，为之排忧解难。

在这一波反共潮中，李济深可谓是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的“亲密朋友”，通过他与“桂系”积极协调，还放走了国民党“黑名单”上的邹韬奋、陶行知、夏衍、徐悲鸿、梁漱溟等人，先后释放被押的进步人士与学生等 70 多人。就在东镇路这所住宅里，他接待了被国民党软禁在桂林的叶挺将军，并妥善安排好了其之后的生活起居。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现实样板

上篇提到，1941 年底，香港沦陷，夏衍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又转移回到桂林。当时，欧阳予倩和田汉等就是一起去找李济深，请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确保这些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全。李济深叫他们放心，表示“决不用这些文化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

大批文化人回到桂林后，人身安全得到了保证，但是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生活困难。李济深对此十分关心。他曾打电话给蒋介石，申请拨款成立一个机构，安置这批文化人从事研究工作，但蒋介石的态度是“已读不回”。

李济深则只好从办公厅有限经费里，挤出一些钱来救济文化界的朋友们。另外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介绍到广西建设研究会任研究员，到文化供应社及其他报社、书店、杂志社任编辑，也有一些介绍到大学及中学任教。自己家多出的房间也用来安置暂时没有住处的进步文化人士。

著名作家王鲁彦没钱看病时，李济深替他付过医药费；田汉的文艺团体被禁演时，李济深批拨一笔军粮解其燃眉之急；桂林大疏散时，徐悲鸿没钱付运费，李济深二话不说拨款 2 万元抢运徐悲鸿 24 箱书画。今日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所陈列的稀世之宝，有一大部分都是从桂林抢运而来。

著名诗人柳亚子在回忆文中提到“讲起我到桂林最初的动机，原来可说是为了投李任潮（即李济深）而来的，因为他有西南文化保护人的盛誉，到桂以来，果然给了我不少帮助”。

由此可见，李济深作为一个军政代表，在文化界却也有着极高的声望，这也解释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万人大游行”时，他为什么能站在 50 名文化界人士之前的原因。要知道当时聚集在桂林的这些文化人，那一个个名字都可以单独撰写一段传奇，聚在一起那是当时文艺圈的“半壁江山”。

这帮文化人士对李济深甚是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依赖。而李济深位于东镇路上的家，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桂林文化圈当时的一个据点，李济深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是刘禹锡笔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实样板房。大家熟悉的田汉、徐悲鸿、柳亚子等在桂期间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讨论抗战局势和国家前途命运。

李济深女儿李筱菊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抗战，学校停课，我们家的小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在家开班，让住在我们家里的文化人给我们上课。这些老师很多都是中国当时著名的大文豪，比如梁漱溟等。中国第一个油画家李铁夫是个独行侠，他在家住了很久，他教我们如何欣赏油画、西方美术史等，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东镇路上唯一一栋保存尚好的民国老宅

东镇路当时可以说是桂林的“富人区”，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济深都曾寓居于此。

1944 年，桂林沦陷前夕，李济深接受周恩来建议，离开桂林回家乡苍梧县组织抗日力量，离开了他在东镇路上居住了 4 年的这座官邸。之后，随着日寇侵入，一场惨烈的战争将桂林古城变为废墟，到处房倒屋塌，残破不堪，一片狼藉，东镇路没有幸免。战后广西当局对桂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李济深的这座官邸也得以恢复。

记者从民革桂林市委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中，桂林东镇路也经历了多次拆迁改造，一些“老房子”随着时代变迁渐渐消失，而李济深的这一所旧居曾一度被作为公房供居民居住，也曾用于其他单位办公使用，但最终还是被幸运地保留了下来。1987 年，李济深（桂林）故居被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桂林抗战名人旧居”的组成部分。

民革桂林市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李济深旧居为仿西式二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319 平方米，有一段时间由于长期空置，缺乏日常维护保养，保存状况不佳。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困难，保护状况曾一度令人担忧。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民革桂林市委一直非常关注李济深（桂林）故居保护和利用工作。最早在 2004 年，当时正逢桂林市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李济深（桂林）故居地处待改造范围内，故居内还居住着多户居民，鸚鵡社区还在故居内办公。黄金地段再加上涉及人员众多，于是想将故居内办公的社区、居住的居民迁出就变成了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民革桂林市委了解到这些后，适时地介入协调工作。提出保护李济深故居的建议，得到当时中共桂林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居民和社区被迁出来，以修旧如旧的方式对当时楼板虫蛀、电线老化的故居建筑进行全面修缮改造。正是那次改造，李济深故居得以保留并进行较大修整。



到 2015 年，民革桂林市委再次推进李济深（桂林）故居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经过多次调研，民革桂林市委及时研究并形成保护利用方案，正式向中共桂林市委提交了《关于加强李济深故居保护利用的报告》。报告中，对故居保护和利用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对故居按原貌尽快启动全面修缮工作；二是加大故居利用，以李济深生平及桂林抗战文化为主题在故居内进行展览陈列；三是将故居建成故居纪念馆，加强宣传推广，提升桂林旅游文化内涵。

中共桂林市委先后对报告做出批示，指示由市财政安排资金启动故居保护项目，按规定安排预算，要按多方筹措资金的办法，开展李济深故居保护和利用工作。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于当年组织实施了李济深旧居维修及复原、陈列展示工程，项目总投资 70 余万元。除对主体建筑进行修缮外，还通过历史照片、文字介绍、场景恢复等形式，再现当年李济深工作生活的场景，展示李济深的生平事迹。展陈工作得到了民革桂林市委委员会以及李济深家乡梧州市苍梧区文化（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

李济深（桂林）故居修缮开放至今，进一步提升和丰富了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的价值和内涵。

图①：李济深旧居外观
图②：旧居客厅
图③：李济深旧居餐厅
图④：连接一二层的楼道

